

## 亚洲繁荣之路： 50年政策、市场和科技发展的回顾

### 前言

1966年，亚洲开发银行（亚行）成立时，亚太地区饱受贫困之苦。当时，养活庞大且不断增长的人口是该地区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半个世纪后，亚洲已成为全球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

50年前，人们并不看好亚洲的工业化和发展的前景。日本在19世纪后期开启了现代化进程，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后快速发展，但人们普遍认为这只是特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当时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之中。印度的经济增长则受制于中央计划的思想及“进口替代”政策。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北的经济开始腾飞——后来成为众所周知的新兴工业经济体（NIEs）——但那时前景尚不明朗。1967年，为促进区域和平，五个成员国携手成立了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然而，这些国家还没有开始基于改革和“雁行”模式的快速增长。中亚国家尚属前苏联体系。亚洲许多国家处于冲突和政治动荡之中。

过去50年来，无论是经济增长、结构转型、减贫，还是健康和教育的改善，亚太地区在迈向繁荣的道路上取得的成就都超出预期。1960年，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为330美元（按2010年定值美元计算）。到2018年，该数字已升至4,903美元，增长近14倍，而同期全球人均GDP仅增长了两倍。因此，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在全球GDP中的份额从4%跃升至24%；如果加上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一份额从13%增加到34%。

亚太地区战后经济成功的原因是什么？

如第一章所述，本书认为并不存在所谓的“亚洲共识”。亚洲奉行的政策可以用通常的经济理论来解释，与“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政策并没有太大差别。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不同的是，

许多亚洲国家在执行这些政策时采取了务实的做法。

在放宽进口限制、开放外商直接投资、放松金融业管制、资本账户自由化等方面，亚洲国家更加循序渐进。例如，她们认识到，资本流动自由化的前提是国内金融业的充分发展。

\*\*\*\*\*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亚洲许多国家的人口快速增长，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增加，给其带来了“人口红利”。同时，发达国家开放的贸易和投资政策也为亚洲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经济环境。特别是近几十年来，亚洲国家从科技进步和全球化中受益匪浅。此外，经济体之间的“收敛”过程也为低收入国家提供了快速增长的机会。

然而，有人口红利和良好的外部环境并不意味着经济一定能够实现快速增长。本书认为，亚洲战后的经济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市场导向和稳健务实的经济政策和有效的制度建设。其他成功因素还包括政府在决策时的务实态度，锐意改革的取向，以及借鉴自身及他国成败经验的能力。在许多国家，有一个得到全社会支持、由富有远见的领导人引领的清晰的发展目标，以及强有力的国家行政系统，也非常重要。

虽然各国在政策组合和执行时间上存在差异，偶尔还会出现挫折和逆转，但成功的亚洲经济体在过去50年中都奉行了经济持续增长所需的政策。这些政策包括开放贸易和投资，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工业化，支持科技进步，投资教育和医疗卫生，鼓励国内储蓄并用于生产性投资，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奉行健全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及促进减贫和增长的包容性。

\*\*\*\*\*

我一直认为，对于亚洲经济成功的探讨往往过于简单化。许多学者，特别是亚洲以外的学者，过分强调政府干预和指导的作用。但是，亚洲的成功主要依赖于将市场和私营部门作为

经济增长的动力。当政策从政府干预转向市场导向时，经济就开始快速增长，而政府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以市场为导向的政策在许多亚洲国家源于其商业和科技发展的悠久传统。在日本明治维新时期（1868—1912年），政府引进了基于西方模式的现代经济制度，也创建了许多产业。但私营部门相当活跃，如修建铁路。日本的电力一直由私营公司提供。20世纪初，中国和印度由私营企业主导的纺织、造纸、制药、钢铁和造船等行业蓬勃发展。

许多亚洲国家通过关税、财政补贴、优惠信贷和税收激励等措施，推行“针对性的产业政策”，以支持工业化。这些政策有成功的，但也有失败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亚洲产业政策的干预程度也逐渐降低，比如更加注重采用鼓励研发的政策。针对性的产业政策，如果使用不当，会导致“寻租”行为、不正当竞争和效率低下。然而，今天许多人也认为，明智地利用产业政策能促进产业的发展，特别是在发展的早期阶段。法国、德国和美国等如今的发达国家都是如此。如果产业政策能够促进竞争，有明确的政策目标和日落条款，并能透明有效地得到执行，那么这些政策就更有可能成功。

以出口为导向的贸易政策也常常被过分强调或误解。日本和新兴工业经济体很早就实施了以出口为导向的政策。然而，这些政策其实应该被称为“外向型的”，因为其目的在于通过促进出口，来赚取更多的外汇，从而保证进口，包括自然资源、资本品和技术。20世纪60年代中期之前，日本一直面临经常账户赤字的问题，不得不间或收紧宏观经济政策。许多其他亚洲发展中国家和经济体也效仿新兴工业经济体，终止了进口替代政策。二战后，发展中国家受社会主义思想和摆脱殖民统治后独立自主的意愿的影响，广泛采用进口替代战略。但该战略助长贸易保护，导致竞争缺乏、汇率高估和效率低下，甚至引发国际收支危机。这在拉丁美洲尤其如此。

\* \* \* \* \*

我认为，基于亚行成员体的经验反思亚洲战后成功的原因是亚行的一项重要任务。2015年，在开始撰写亚行自己的历史书《打造亚太美好未来》<sup>1</sup>时，我们已经萌生了写一本与之配套的亚洲经济发展史的想法。

这本《亚洲繁荣之路：50年政策、市场和科技发展的回顾》起笔于2017年亚行历史书出版之后，历时近三年完成。本书分14个主题，描绘了亚洲过去50年的多元发展和变革，并强调了政策、市场和科技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本书的讨论涵盖亚太地区46个亚行发展中成员体，其中包括曾是亚行借款国的新兴工业经济体。还酌情讨论了澳大利亚、日本和新西兰的经验。第一章是后续14章的总结和摘要。

有关亚洲经济发展的研究很多，如1993年世界银行出版的著名的《东亚奇迹》<sup>2</sup>。与以往的研究相比，本书具有如下鲜明的特点。

第一，本书除了新兴工业经济体和东南亚诸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以外，还讨论了南亚、中亚、太平洋岛国和其他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和经济体的快速转型，时间跨度从战后初期延续至今。本书描述了从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化改革的过渡，以及中国、印度、柬埔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越南和中亚国家经济的强劲增长。21世纪初以来，包括孟加拉、菲律宾的许多亚洲发展中国家增势强劲。即使在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除新兴工业经济体以外的亚洲发展中国家和经济体的年平均增长率仍保持在6%左右（意味着每12年收入翻一番）。

第二，本书讨论了亚洲和世界的新问题和新趋势。书中讨论了气候变化、海洋健康和人口老龄化等挑战，全球价值链、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影响，以及日趋重要和多元的新兴服务业。

---

<sup>1</sup> 彼得·麦考利，2017。《打造亚太美好未来：亚洲开发银行50年史》。马尼拉：亚洲开发银行。

<sup>2</sup> 世界银行，1993。《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

本书还回顾了亚洲国家和经济体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的方式。

第三，许多来自亚洲、北美和欧洲各成员体的亚行职员参与了撰写工作，帮助加深了对各国经验的理解，也使得观点更加平衡。亚行业务部门的职员参与了书中有关健康、教育、性别、农业、能源、交通、供水、环境和气候变化以及区域合作与一体化等章节的撰写。

在撰写过程中，我们试图使各章节内容更加通俗易懂，在涵盖各种事例、数据和国别案例的同时，避免过于技术性的讨论。本书还讨论了影响整个亚洲政策制定的经济发展理念的演变。

\* \* \* \* \*

许多人认为，21世纪是“亚洲世纪”，对此我持保留意见——尽管我为亚洲的成功及其经济地位的日益提升感到欣慰。亚洲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一半以上，所以到2050年，亚洲GDP超过全球GDP的一半并不足为奇。亚洲发展中国家仍面临许多挑战，包括持续的贫困、收入不平等的加剧、性别鸿沟、环境恶化、气候变化（严重影响太平洋岛国），以及医疗、教育、电力和安全饮用水等服务的不足。我们切勿骄傲自满。

在过去50年里，除了某些国家在某些时期经历了战争和动乱以外，亚洲整体上保持了一个和平的环境。和平和稳定为亚洲经济的成功奠定了基础。亚洲国家必须继续努力，加强合作，在地区内外不断发展友好关系。

亚洲的经验和创新令人振奋，但亚洲要达到西方过去五个世纪以来的影响力，还要假以时日。亚洲必须继续加强自身制度建设，为科技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在应对全球性问题上承担更多的责任，并更加清晰地提出自己的主张。我希望亚洲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以推动建设更加包容、一体化和繁荣的国际社会。

\* \* \* \* \*

我十分感谢本书的撰写团队、管理团队、秘书处、亚行各部门职员和咨询专家的贡献和辛勤付出。也十分感谢亚洲内外学者提出的宝贵意见。

本书撰写团队由亚行首席经济学家兼经济研究和区域合作局（ERCD）局长泽田康幸（Yasuyuki Sawada）和ERCD高级经济顾问庄巨忠领导，二人也是本书主要作者。行长高级顾问许霓妮（Niny Khor）详细审核本书内容，并协调撰写过程。ERCD的利娅·苏慕隆（Lea Sumulong）带领秘书处提供了技术和研究支持。在过去三年里，他们和其他贡献者的不懈努力成就了这本书。

我衷心希望本书通过全面回顾亚洲过去50年发展历史，能加深了解，促进讨论，从而帮助亚洲和世界应对仍然存在的发展挑战。

中尾武彦  
行长兼董事会主席  
亚洲开发银行  
2020年1月